

詹姆斯·奥康纳对现代性的“生态学批判”： 检视及启示

胡绪明，杜雅丽

(上海理工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093)

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蕴含着独具特色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以詹姆斯·奥康纳为例，从他对现代性的“生态学诊断”、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的“生态学重建”三个方面展开讨论，通过其揭示现代性的生态学旨趣。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詹姆斯·奥康纳；生态学批判；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B 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95X(2014)04-0378-04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014.04.016

Viewing James O' Connor's "Ecological Criticism" in terms of modernity and its inspiration

Hu Xuming, Du Yali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In the camp of critical modernity,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criticism is unique and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ake for example, the three aspects of James O' Connor's "eco-diagnosis" of modernity, the "ecological critique" to th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ecology renewal" of traditional socialism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revealing ecology purport of modernity.

Key words: ecological criticism; James O' Connor; ecological critique; modernity

在整个现代性话语中，从目前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几乎都没有涉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实际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蕴含着独具特色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就詹姆斯·奥康纳为例，首先，他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生态学诊断”：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是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并存的双重危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其次，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生态学批判”，认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生态空场”，需要对其进行重构；最后，进行了“生态学重

建”。奥康纳认为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以“生产性正义”为基础，构建生态的现代性理念，走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本文拟从以上三个方面深入探讨，旨在揭示现代性的生态学旨趣^[1]。

一、奥康纳对现代性的“生态学诊断”

奥康纳生态批判理论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他在对西方绿色运动及其“生态中心论”批判的基础上，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生态学诊

收稿日期：2013-11-10

基金项目：上海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攀登计划”项目（12XPB02）

作者简介：胡绪明（1973-），男，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E-mail: huxm1973@126.com

断”。在奥康纳看来,“生态中心论”者的“反工业生产、反经济增长、反科学技术”^[2]的观点带有明显的后现代性质,奥康纳反对生态中心主义对现代化运动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在他看来,首先,造成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并非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不应该一般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而应该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以生态为中心,而在于是否以利润为中心。因此,奥康纳主张重返人类中心主义,当然这种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同的,它以人类的真正需要为基础,是一种长期的人类中心主义。其次,和生态中心主义把科学技术看成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不同,奥康纳坚持认为技术本身并无对错可言,不应该对技术本身进行批判,他主张批判的是被资本主义所控制的技术理性所导致的技术的非理性运用,以及对自然的无止境掠夺。

综合以上两点,奥康纳提出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是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并存的双重危机,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表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解释已经失去了其效力,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马克思过高地估计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双重矛盾和危机。第一重矛盾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产生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第二重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会导致生产不足的生态危机。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为资本追逐利润的动机,在他看来,资本追求利润的扩张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不可持续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本性与可持续发展是互相矛盾的。从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来看,资本眼中的可持续发展必然是追求利润的扩张逻辑,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资本把自己装扮成绿色爱好者,为自己塑造绿色形象;从生态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来看,可持续发展必然是对那些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以及高污染的产业征收重税,发展清洁能源,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而这与资本扩张的逻辑是背道而驰的。奥康纳强调,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是对生产条件的日益破坏,最终导致严峻的生态危机。由此,诊断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并不

是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科学技术,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

二、生态空场:奥康纳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批判”

奥康纳通过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展开了对现代性问题的“生态学批判”。在奥康纳看来,传统的马克思哲学缺乏“丰富的生态感受性”,缺失“对土地的挚爱”。因此,需要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构,使之能够包容生态学的观点。而“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的结合就在于把“自然”和“文化”两个维度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奥康纳指出,一方面,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仅仅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追求剩余价值这一目的之下,必然加大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由此就产生了由于需求不足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规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资本家对工人和自然界剥夺的无止境造成了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破坏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另一方面,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确实缺乏生态维度。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认识,奥康纳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当代面临着双重任务: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需要将自己的内涵向外扩展到物质自然界之中去”^[3];第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需要将内涵向外延伸”^[3]。基于此,奥康纳将“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之中,通过建构文化—劳动—自然“三位一体”理论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奥康纳强调,自然、社会劳动和文化三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一方面,从社会劳动和自然的关系来看,人类的劳动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基础上,自然的客观规律制约着人类的生产活动,反过来,人类劳动又利用客观规律,不断改造着自然生态系统;另一方面,人类劳动和文化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社会劳动被赋予了文化的特征,同时社会劳动的各种形式也制约着人类的文化实践;最后自然和文化也是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的,自然中包含着文化的特征,文化中彰显着自然的因素。奥康纳把“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所形成的文化唯物主义,对于建立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关系具

有积极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奥康纳的文化唯物主义直接决定了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生态社会主义。

三、生态社会主义:奥康纳对社会主义的“生态学重建”

基于对现代性问题的“生态学诊断”和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批判”,奥康纳强调,生态资本主义不可能解决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出路。他指出应当超越单纯的绿色或红色政治,走向红绿结合,即要在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二者之间找到某种结合点,主张把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解决生态危机。

在奥康纳看来,传统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注重对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的普遍的、定量的批判,而后者则强调对资本主义/使用价值的特殊的、定性的批判;前者关注资本的生产与流通,强调抽象劳动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关注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强调具体劳动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的缺陷在于它从抽象劳动的方面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工人的经济剥削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在各个阶级、地区、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变化,发达国家欠发展中国家经济债,而未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具体劳动方面造成对工人的生态剥削,发达国家欠发展中国家除了经济债外还有生态债。因此,奥康纳提出了重建“生产性正义”的现代性理念,他认为应该用“生产性正义”来代替传统社会主义的“分配性正义”。他认为,传统的“分配性正义”本质上强调的还是一种交换关系。要想实现真正的平等,必须实行生产性正义,进行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奥康纳强调,要恢复对“生产性正义”的追求,就必须坚持“全球性地行动,全球性地思考”这一原则。因为地方性的生态问题也是全球资本主义权力分工的结果,只有这一原则才能打破资本主义的全球权力关系,生态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而要打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现“生产性正义”和“全球性地行动,全球性地思考”,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是根本出路。

四、现代性“生态学批判”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检视及启示

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具有其较为深刻的地方,但问题并没有真正的解决,“他的批判还没有真正揭示现代性意识形态所遮蔽的一面,这种批判依然在形而上学二元分立的范畴之内”^[4]。举例来说,奥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生态空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缺少对土地的挚爱以及丰富的生态感受性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缺失等,不难看出奥康纳的批评是站在伦理主义的批判主义立场之上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和自然界是统一的,人对人来说是作为自然界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人来说是作为人的存在,他这样写道“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5]。《手稿》中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难道能说自然在马克思理论中地位是缺失的吗?马克思的实践即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恰恰超出了现代形而上学的框架。其次,奥康纳以文化唯物主义代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重构马克思的基本矛盾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当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做法应该是,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分析社会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而不是随意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泛化或窄化的理解。再次,奥康纳的双重矛盾和危机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否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质。最后他构建的生态社会主义,依然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是对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改良,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范畴。由此可见,奥康纳的现代性“生态学批判”无疑还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他的批判还没有深入到历史的本质即社会现实的这一度,尽管如此,其理论对在资本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来说,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首先,对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具有

积极的作用。现今当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比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已经摆脱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能够可持续发展时,奥康纳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资本主义与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兼容性,正是资本的逻辑导致了生态危机,这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以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和新方法,对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生态危机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奥康纳建构的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奥康纳以“协作”范畴为切入点,揭露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自然和文化特征,并把自然、文化和社会劳动三者结合,突出了自然和文化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改变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简单归结为决定和被决定的单一关系,另外,奥康纳的理论也使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体系,我们应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后,在当今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时刻,奥康纳的生态批判理论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坚持生态批判,促进生态文明理论自觉。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人类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的结果,是人类力图摆脱生态危机,寻求新的发展道路的理性自觉。这就决定了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建设,一方面要吸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坚持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另一方面要克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缺陷,进而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建设必须坚持生态批判,强化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并吸收西方先进的生态思想资源和理论成果,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2) 重塑生态理性,统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经济实力也跃居世界第二。但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也付出了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沉重代价。当前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反映出经济理性在现代文明发展模式

中起着主导性作用。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得不反思经济理性及其主导下的工业文明的生存生活方式,只有超越经济理性,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性,用生态理性来统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才能使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落实到我国的现代化实践中。

(3) 坚守生态正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奥康纳指出,基于资本的逻辑,资本主义社会自身不可能解决生态矛盾,同时为了满足垄断资本家的利益追求,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经济和技术的优势,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推行生态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生态掠夺来转嫁和缓和本国的生态危机,正是生态帝国主义行径加剧了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如此,一些发达国家还批评发展中国家资源浪费、破坏生态平衡等,甚至借口环境问题来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例如,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资本的既得利益,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以生态保护为幌子,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比如不准砍伐森林,不准发展自己的工业等所谓的绿色条件,并取消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贷款,加强贸易封锁和禁运,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绿色贸易壁垒,但同时又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污染工业。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产生生态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的殖民剥削和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当今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坚守生态正义,追求公正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同时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切实保障我国的发展权利和环境安全,在全球生态资源分配和使用上争取话语权,同时为实现对全球生态正义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胡绪明,丁海蒙.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问题刍议[J].社会科学战线,2012(3):17-20.
- [2] 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4] 吴晓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生态思想[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6):77-84.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编辑: 巩红晓)